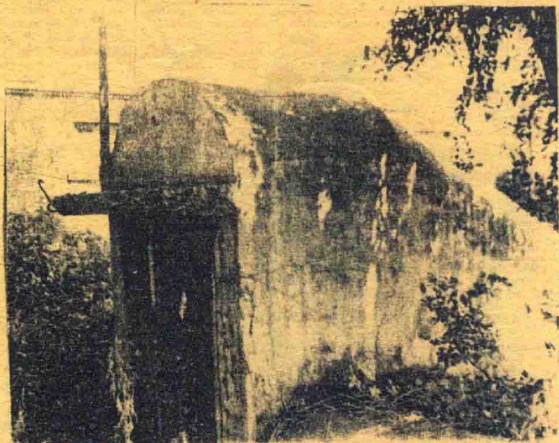


日本关东军平房细菌工厂纪实

.....韩晓 邹得里

日军七三一部队法西斯暴行辑录

.....韩 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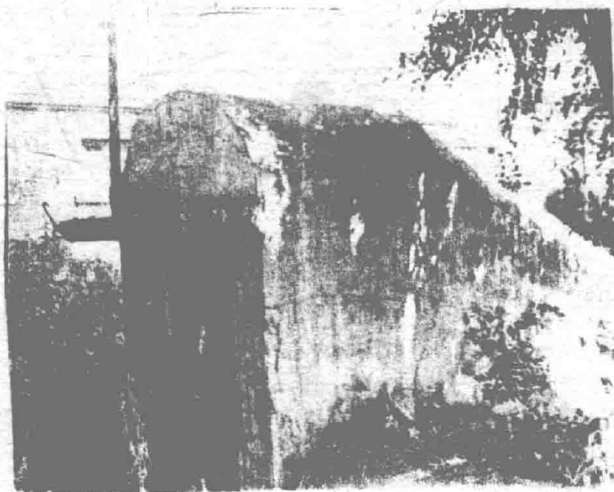


日本关东军平房细菌工厂纪实

.....韩晓 邹得里

日军七三一部队法西斯暴行辑录

.....韩 晓



日本关东军平房细菌工厂纪实

韩 晓 邹得里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不久，就在哈尔滨市南郊的平房区建立了一座细菌杀人工厂，其代号为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亦诡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这个罪恶的魔窟，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今天，它虽然仅存一点残垣断壁，但是，它的罪恶历史却永远存在于人民的记忆中。

从石井细菌研究所到七三一部队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作为亚洲的列强~~——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着手从事细菌武器的研究工作，以便在必要时进行细菌战。一九三一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以后，~~日本陆军省和陆军参谋本部~~根据日本天皇摄政裕仁的敕令，在中国东北组织了石井细菌研究所。他们纠集了一批日本细菌学者秘密地进行细菌武器研究。曾任日本关东军医务局局长的堀冢龙二，就是运用细菌武器的鼓吹者，他竭力支持和推荐石井四郎以侵略战争为目的而加紧研究细菌武器。

石井四郎是日本著名的医学家和细菌学家。一九二四年他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当研究生时，专门研究病理学和细菌学。一九二八年充当了东京军医院军医，后来被派出国考察，周游欧洲。回国后竭力进行细菌战的鼓动工作，在军医

学院及日军参谋本部里成了一个时髦的人物。石井四郎鼓动细菌武器研究的主张，得到了日本陆军省务署长永田少将的称许，也得到了日军参谋本部战略部第一课课长铃木大佐的支持，让他亲自领导在中国建立的细菌研究所。

在石井细菌研究所成立的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先后在中国华中、华北、华南和东北建立了几个细菌研究部门和为细菌研究服务的机关。

石井细菌研究所，匿名称“石井部队”，也称“加茂部队”或“奈良部队”，开始，说是设在滨江站附近，实际上是在东北拉滨线（拉法—哈尔滨）上背荫河建立的中马城细菌工厂。那是一九三三年（大同二年）八月建立的。翌年（康德元年）被我党地下工作者炸毁。他们唯恐暴露秘密，决定转移。

一九三六年，日本陆军省和日军参谋本部又根据日本天皇摄政裕仁的敕令，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两个细菌部队：一个是在长春以南五公里的孟家屯附近的华人村建立的九十三号军事基地——“关东军兽类传染病实验局”（也称“关东军兽医防疫研究所”，匿名“一〇〇号部队”），另一个就是在哈尔滨以南二十公里的平房建立的十七号军事基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或称“关东军用水供应及疾病预防局”，也称“东乡部队”）。如果说它是由背荫河移驻来的，不如说它是石井部队的扩大。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以后，改名“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一九四五年五月，在苏联反击德国法西斯的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作垂死挣扎，又把七三一部队改称“关东军第二五二〇二部队”。

十七号军事基地的建立

一九三六年日本帝国主义选定平房站以北四公里处的正黄旗五屯、正黄旗头屯、正黄旗三屯、三家子、黄家窝堡、刘家窝堡的中间地带，建立十七号军事基地——细菌杀人工厂（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从此，平房就成为这六个村屯中间的六点一平方公里的代称。

一九三六年春，日本侵略者派人来到这里进行勘测和规划，并在军事用地四周钉上了标桩。是年秋天，通过日伪当局出示布告，强行命令黄家窝堡限期搬迁，把这屯的大部分居民撵到正黄旗四屯以远的地方，随后就把全屯一百二十垧良田全部强占，变成了七三一部队的军事用地。从此，黄家窝堡这个地名就在地图上消失了。转过年，三家子、刘家窝堡也被令其强迁。一九三八年阴历八月十五日，日伪当局强令正黄旗头屯、正黄旗五屯迁移，限期一个月，逾期不搬者以法论处，并把房子烧掉。正黄旗五屯西南的一片百十垧地被占用修建了细菌工厂，东南角的百十垧地占用后修了飞机场。全屯三百四十户人家，除了投亲靠友外，绝大部分住户被撵到该屯西北的裴家窝堡（后来叫新五屯），正黄旗五屯变成了建筑细菌工厂的劳工棚。被撵的居民由于无钱盖房，有百分之八十的住户只好搭设“地窖子”度日。正黄旗头屯位于七三一部队的西北角，村南的一百七十垧地被占用，全屯一百四十户居民被撵得无处安身，有的被撵至双城县境内。

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八年，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强占民田七百垧，强迁村屯五个，拆毁民房一千七百多间，使六百余户居民流离失所。

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霸占土地，强占民房，给平房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当时，一般地价为每垧地四百多元，七三一部队征用每垧出价一百二十余元，除掉日伪官吏从中盘剥克扣，中国农民拿到手的不足一百元钱。再拿房价来说，当时每间草房满值三百元钱，七三一部队占用，对好房每间只给六十元钱，对旧房每间只给三四十元钱，对有的房子根本不给分文。迁屯当时正值秋季，新粮没打下来，农民只好吞菜度命。无处安身，无米下锅，被迁居民饥寒交迫，其中不少人被夺去了生命。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就在中国人民的尸骨堆上修建起了细菌杀人工厂、飞机场以及宿舍、娱乐场所。

特别军事区域

一九三九年这个细菌杀人工厂刚建成，日伪当局就把以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驻地为中心，东至后二道沟，南至韩家店，西至正黄旗三屯、正黄旗四屯，北至新五屯的方圆三十二点二四平方公里的地方划为特别军事区域。在这个区域的四周插上界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颁布了一五三九号训令，规定“平房石井部队房屋（围墙以内）均指定为特别军事建筑物”，为保密起见，规定“在附件要图上所标明乙号地段内，禁止建筑二层以上的新房屋”，“对民用航空（满洲航空株式会社）指定有航空线和禁航地带”。在这个区域内，由日本宪兵队和伪平房警察所严密地封锁着，并进行着法西斯式的专制管理。没有居住证明书不准停留，就连在田地里劳动的农民，也得随身携带特别居住证明书。如果没有居住证明书，一经查出就以政治嫌疑犯的罪名抓起来。在这个“特别军事区域”的上空有日本警备飞机巡航，严禁外部

飞机进入这个空域。他们把从周家到平房站以北的孙家站这段路程称作“六十里地国境线”，火车路过平房站，在前一站必须把窗帘放下，不准向车外瞭望。如有人向外偷看，就以政治嫌疑犯的罪名关进警察署。当时人们痛恨地说：“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都没有人身自由！”

这座细菌工厂建设用地大约有六点一平方公里。在细菌研究、生产和试验的中心区域，设立了两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用高墙围着，墙上架设高压电网，墙外设置防护壕。在围墙四周设立东、南、西、北四处卫兵所。南门只允许七三一部队本部人员出入使用，西门平时关闭着，特殊情况可以使用，东门和北门是中国劳工上下班的必经之关。沿着围墙有日本军人巡逻，在动力班大烟囱、给水塔和“方型楼”的南北制高点设瞭望监视哨，主要监视中国人的行动。

第二道防线，设在“方型楼”的四周，圈有土墙，占地七万九千二百平方米。这里有一座连接式的三层高的方型高大建筑物，它的主楼走廊连通着总务部、诊疗部，还通过地下道连通解剖室和焚尸炉。这里是细菌研究、生产和试验的中心场所。在主楼两侧的空场上，设有两处秘密监狱，关押着被试验的人，由石井四郎的二哥次男刚男亲自管理。

“方型楼”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七三一部队的绝密要害部位，戒备森严，不仅中国人不得进入，而且日本有关人员进入也得经过严格地审查，中国劳工只能在第二道防线以外被迫从事繁重的劳动。

为了保密，细菌工厂的建筑都由日本专业人员进行设计，由日本关东军御用单位——铃木和大铃建设株式会社进行施工，中国劳工只是当作苦力去使用。他们从中国各地强

抓或骗招大批中国劳工。劳动是强制性的，进来后每人的名字都以号码代替，每天出入工地都是日本兵武装押送。在细菌投产阶段，劳工的来源稍有变化，少部分劳工是从外地骗招来的，大部分是从“特别军事区”域内摊派而来。当时规定，凡是十七岁至五十岁的男性劳动力，每年出劳役四个月。如果一家有三个劳动力，就得有一名劳动力长年服劳役。

无论是从外地骗招的劳工，还是从本地摊派的劳工，来到这里都失去了人身自由。对每个劳工颁发劳工证明书，每天上工前集合点名，还得集体背诵国民训。上工时，得出示劳工证明书，在工地上只能在指定地点劳动，不准东张西望，交头接耳，更不准和其它班的劳工接触。下工后路过门岗都得搜身检查。在劳工之间实行十人联保制，如果有一人“越轨”或逃跑，就拿其余九人是问。

劳工们的活动随时受到监视。对待劳工除了有劳务组织的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进行管理和监督外，还由日本班长进行全面管制。七三一部队还经常秘密派出“化妆劳工”，混进劳工的各个班，他们很少干活，对其他劳工进行秘密监视。有一次，一个“化妆劳工”向日本人打了个“小报告”，八木班的劳工赵玉良、张朝德被日本工头“大红脸”传了去，让他俩面对面地站立，相互打嘴巴子，他们管这种体罚叫打“协和嘴巴子”。一九四三年春，有一个海城来的劳工，因年纪大，人们叫他老李头。他在点名时晚到一步，被劳务中队长连打两个嘴巴子，把棉帽子都打掉了。接着有个叫竹烈的朝鲜人监工甩起鞭子把老李头抽得鼻口流血，差点病死。

七三一部队不管劳工们的死活。一九三七年春，河北省

献县的赵殿启被骗招到平房，给七三一部队修筑日本家族宿舍，一天挑运砖十二三个小时，连橡子面都吃不饱，实在受不了，于当年秋天一个夜晚，和一同来的两个老乡一起逃出了虎口。一九四四年十月，进来了八百多名劳工，是用火车从海城、大石桥、锦州运来的。火车一到平房站就发现死了一个。当时说他是得了传染病，七三一部队以防疫为名迫使劳工脱光衣服，并把衣物都扔进大锅里进行热气消毒，衣服捞出来以后根本不能穿了。劳工们被隔离两天以后，光着身子被押进劳工棚里。劳工们连冻带饿，不少人病倒在炕上，死人的情况连续发生，不到两个月仅剩下二百多人了。据在动力班当过劳工的潘义勇回忆，一九四二年七月，有个叫王纯×的劳工，因上顿接下顿的吃苞米和橡子混合面窝窝头，得了肠梗阻，官方又不管，自己又没钱医治，不久就折腾死了。在动力班当过劳工的金国忠，曾看到海城劳工有十多个病倒了，官方不仅不给医治，还催促患病的劳工上工。第二天就有两个劳工病死，还是同屋的难友把尸体埋在“劳工坟”里。

据在七三一部队当过劳工的多人证实，正黄旗五屯北门外的“劳工坟”里，每天都有新增加的坟堆，仅四五年这里就埋葬中国劳工的尸体上千具，直到六十年代，这些坟包还显而易见。

东 乡 村 概 貌

日本关东军七三一部队的驻地位于正黄旗五屯、正黄旗头屯、正黄旗三屯、三家子、黄家窝堡、刘家窝堡的中间地带。距细菌研究、生产和试验中心——“方型楼”西南一千米处，连排着二十二栋楼房，这是日本人单身宿舍、日本家

族宿舍和高等官宿舍。这地方原来没有名字，七三一部队占据后，因该部队曾称之为“东乡部队”，故把这个地方叫“东乡村”。

在“东乡村”的东部设有一座千人座席的大礼堂，大礼堂的内厅设有图书馆、“酒巴间”，在“东乡村”的四周还有游泳池、小花园、小“酒巴间”、洗澡塘、饭馆、鱼菜供应部、运动场、日本人妓院等，这是七三一部队队员及其军属寻欢作乐的场所；在它的东北部的动力班，是发电所、取暖锅炉房、给水所，担负着细菌工厂和日本人住宅区的供电、供热、供水的任务；在它北侧是由四幢平房组成的日本家族医院，供日本军人及其家属医病之用。在它的西北角是东乡神社，日本军人及其军属常来这里朝拜天皇，日本小学校，原来设在“东乡村”东部，后来迁至“东乡神社”西边。

在“东乡村”范围内，允许中国人靠近。附近农村的农民经常担着鲜菜、鸡蛋到这里叫卖，有时还可以收揽些拆、洗、缝、补的活计，不过这里可是个危险地带，随时都有中国人挨打受骂事件发生，甚至发生过流血事件。

当时，七三一部队的队员及其家属虽然生活在这个“世外桃源”里，但是也感到生活的枯燥和寂寞。队员们只能活动在工作岗位和居住区之间，就是在业余时间，也不能随便外出。有时经过批准，才可成帮结伙地到郊外游玩或改着便装到五十多里以外的松花江边游览。队员及其家属大部分业余时间消磨在种植蔬菜和花草上。据当时在劳务班当过苦工的中国人证实，日本人特别是那些少年队员经常愁眉苦脸，甚至流露出厌倦工作的思念家乡之情。

庞大的组织机构

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准备细菌战的特种部队，在战略上占有重要地位。日本军人所谓的“小小的哈尔滨，大大的平房”，在某种意义上正说明了这一点。就其规模来说，实属世界上最大的细菌工厂。就其地位来说，它归属日本陆军省、日军参谋本部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双重领导。人事配备是很强的。拥有从事细菌战研究工作人员二千六百余人，其中将级军官五名，佐级军官三十余名，尉级军官三百余名。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二年七月由石井四郎中将为部队长，一九四二年八月到一九四五年二月北野政次少将接任部队长，一九四五年三月到同年八月石井四郎又重任部队长。它的直属各个部以及各支队都配备佐级军官负责，对一些重要部门都配备了少将级军官负责。

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下设八个部：

第一部（细菌研究），菊地少将为部长。下属有专门从事鼠疫研究的“高桥班”，从事病毒研究的“笠原班”，从事细菌媒介——昆虫研究的“田中班”，从事冻伤研究的“吉村班”，从事赤痢研究的“江岛班”，从事脾脱疽研究的“太田班”，从事霍乱研究的“湊班”，从事病理研究的“冈本班”和“石川班”，从事血清研究的“内海班”，从事伤寒研究的“田部班”，从事结核研究的“二木班”，从事药理研究的“草味班”，从事立克次氏体（包括跳蚤）研究的“野口班”。

第二部（细菌试验），由太田大佐兼任部长。这个部下设一个分部，专门培育和繁殖供散布鼠疫菌用的寄生虫。下属一个航空班和在安达东三十五里的鞠家窑的特别试验场。

这个部的主要任务是除了用人作细菌试验之外，还通过“八木泽班”对植物进行病毒研究和试验。

第三部（细菌武器制造），由江口中佐任部长。这个部下属两个工厂，一个是滤水器制造厂，这是为掩人耳目而设的。另一个是在杨马架子的瓷弹壳制造厂，专门生产“石井式”细菌炸弹等细菌武器。

第四部（细菌生产），由川岛少将任部长。这个部下设两个分部，每一分部按照分工独立地进行各种细菌的生产。

总务部，起初由中留中佐为部长，后由太田大佐兼任。该部是七三一部队本部的综合部门，权力很大，它不仅负责整个部队的财务管理、生产计划、人事分配，而且更重要的是直接与宪兵队联络和接收作细菌试验的人。

训练教育部，起初由园田大佐任部长，后来由西中佐接任部长。这个部专门负责培训从事细菌研究、生产和使用细菌武器的专业人材。据资料记载，仅少年队员的培训就进行了四期。

资料供应部，由大谷少将任部长。这个部负责各种器材、设备的供应。

诊疗部，由永山大佐任部长。这个部负责对细菌传染的预防和日本人的疾病医疗事宜。

与各部平行的还有一个石井特别班，由石井四郎的家族人员亲自把持。石井四郎的二哥次男刚男负责“特别秘密监狱”的管理，石井四郎的三哥三男负责试验动物饲养的领导工作。

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下设四个支队：

林口支队（又称一六二支队），设在现在的黑龙江省林口县东十里的古城镇，有日本研究人员二百二十六名，榊原

秀史少佐为支队长。

孙吴支队（又称六七三支队），拥有日本研究人员一百三十六名，西俊英中佐为支队长。

海拉尔支队（又称五四三支队），拥有日本研究人员二百二十六名，加藤恒则少佐为支队长。

牡丹江支队（又称六四三支队），设在现在的黑龙江省海林镇东十五里处，拥有日本研究人员二百名，尾上正男少佐为支队长。

各支队的主要任务是从事各种细菌的研究和饲养，供试验用的动物以及繁殖传染细菌的媒介物。

细菌生产及细菌武器的制造

平房细菌工厂的建设，经过充分准备，于一九三六年开始动工，一九三八年背荫河细菌工厂的部分设备搬迁到平房，到一九三九年平房细菌工厂基本上完成了总体建设，并进行了部分生产。一九四〇年全面投产。

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平房细菌工厂拥有雄厚的细菌生产设备。有孵育器四千五百具；有容量一吨的制造培养液的锅炉四个和容量两吨的制造培养液锅炉两个；有培养器一千八百具；营养液消毒器三十具（消毒器的规格长三米，直径一米五，每具可容纳石井式培养器三十个到六十个）；有整温器五具（每具可装六百二十个培养器）；有培养液冷却室两个（每室可容纳一百个培养器）；还有保存产品的特种冷藏室。

这个细菌工厂每一个生产周期就可生产三百亿具有中等繁殖能力的微生物。由于细菌产量大，只好用公分来计算细菌团的体积，或者用公斤计算细菌的重量了。据原七三一部

队队员的测算，这个细菌工厂每月可生产鼠疫菌三百公斤，或者生产炭疽菌五百至七百公斤，或者生产伤寒菌八九百公斤，或者生产霍乱菌一千公斤。

在一九四〇年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之前，日本军国主义为了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天皇摄政裕仁发布了一个敕令，要求在进攻苏联的各个战略位置上建立细菌生产基地。在这个敕令下，分别在孙吴、海拉尔、海林、林口建立了四个支队。日本陆军省和日军参谋本部对这些支队的建立时间、驻扎地点以及规模都作了具体规定。战后，我们缴获的曾任陆军相东条英机签字的敕令附件的人员表中，规定了每个支队人员为三百人。同年下半年各支队建立后，东条英机责成日本军医院和七三一部队本部要抽出定额的医生、专家和士官派往各支队，并允许各支队接纳雇员，但规定雇员的数量不得超过各支队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以后，石井四郎被召回日本，接受日军参谋本部的紧急指示。他从东京飞回平房后，立即召开本部各部长会议，传达了日军参谋总长关于加紧准备细菌战争的训令。石井四郎在这次会议上说：“一切扩大细菌武器生产的办法之所以必须施行，是因为国际形势已发生变化，德对苏战争已开始，以及因为关东军已实施反苏军事措施准备的‘关特演’计划（即一九四一年夏季关东军计划进攻苏联的特别演习），所以我们的军队应当充分具有足够的细菌武器，以便在必要时去反对苏联。”

日军参谋总长的训令还要求七三一部队在短时期内要完成培植二百公斤跳蚤的任务。

在这次会议上，第二部部长太田大佐和器材供应部部长大谷少将感到压力很大。因为随着细菌产量加大，媒介物的

生产也要相应增加，然而媒介物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因此，他们建议设法在中国找到白鼠来代替日本白鼠。他俩的意见得到了采纳。从此以后，七三一部队更加繁忙了，昼夜开动机器，使各种细菌产量累累增加。随着细菌产量的上升，本部和各支队增殖老鼠、跳蚤等媒介物和计划也随之加码。尽管这样，还感到媒介物不足，于是在本部和各支队附近，向中国老百姓摊派上缴黄鼠的任务。据正黄旗二屯、后二道沟的老户证实，每年每户必须上缴五只黄鼠。为了完成摊派的上缴黄鼠的任务，不少居民必须到十里以外的地方挖掘黄鼠。把这些黄鼠先交给村公所，然后由村公所直接转交给七三一部队。

与此同时，杨马架子瓷弹壳厂抓紧生产“石井式”细菌炸弹。这种“石井式”细菌炸弹是瓷弹壳，爆破后产生的温度较低，细菌成活率可达百分之七十以上，改变了过去铁弹壳爆破后产生高温，细菌成活率低的缺点。这种“石井式”细菌炸弹有两种规格：一种是直径为六厘米、重量为两公斤，爆破后飞散有效杀伤半径为十五到三十米；另一种是直径为八厘米、重量为四公斤，爆破后有效杀伤半径为五十米到一百米。

为了提高细菌武器的生产能力和进行必要的战略疏散，七三一部队对各支队补充了必要设备。据原细菌生产部科长唐泽富雄在军事法庭上供认：“一九四四年上半年，七三一部队的设备颇大一部分分散到各支队去了。”

由于以苏联为主的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日本军国主义感到处境更为不利，于是于一九四五年三月，日本军参谋本部又把石井四郎中将调回七三一部队，要他执行增加细菌生产的训令。这时，石井四郎提出要挟条件，日本

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不得不满足石井的要求，亲自批准又给七三一部队增加一些专家和设备。石井把这些专家和设备拨给了各支队。在这期间，仅孙吴的六七三支队就有数十人专门培植跳蚤和繁殖啮齿动物。海拉尔的五四三支队在一个夏季就豢养老鼠一万三千多只。据在林口一六二支队当过劳工的张清林证实，一九四五年春夏季，支队向七三一部队本部上缴老鼠的任务越来越紧了，每天把老鼠用马车送到古城镇车站，每车装二十个笼子，每个笼子装二三十只老鼠，先后两次往哈尔滨运送老鼠四千多只。

“特殊材料”的“特别输送”

日本宪兵队机关和伪满当局根据七三一部队的要求，经常把华中、东北各地的中国人、苏联人、蒙古人和朝鲜人秘密地押送到七三一部队，供细菌试验之用。被押送的人大多数是被俘的八路军、新四军、苏联红军、地下工作者和反满抗日的工人、教员、学生，还有所谓的政治嫌疑犯。

在运送期间，恐暴露罪恶的秘密，日本宪兵队官方给被押送人员规定了一个专用名词：“特殊材料”“特别输送”。据日本宪兵署的文件记载，自从一九三九年，就有“特别输送俘虏”之事。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城仓少将于一九三九年发布过将三十名俘虏“特别输送”到石井部队的第二二四号命令。

命令中明确规定：“第二批特殊运送人员约九十名……除留下六十名送达目的地外，其余诸人在到达哈尔滨时即交付石井部队长。”并要求“须事先将应交付石井部队的人员区分开来，以免在交付时发生延误。”还要求“哈尔滨宪兵队长须与石井部队长取得密切联系，保证在哈尔滨站及以后途

中竭力防止外国侦探，并采取必要监督办法。”

往石井部队“特别输送”俘虏的事是存在的。不少见证人曾看到下列事实：

哈尔滨宪兵队备有专用的囚车，车体是灰绿色，左右两侧安装两个实际不透明的窗户，车底设有通气孔。这种囚车频繁地活动在哈尔滨一平房之间的砂石公路上。每次行动都是日本军人武装押送，大约每周运送一次，输送的数量不等，有时二三十人，有时四五十人。囚车来时发出刺耳的怪叫声，日本兵把在室外作业的中国劳工撵到屋子里，不让偷看。有时被迫趴在地上的中国劳工斜视偷看，就会发现被押送的人都被蒙上了眼睛，并带着沉重的手铐、脚镣。

曾在动力班当过劳工的人证实，差不多每星期六下午有一辆囚车开来，把在押人员从南门或东门押进“兵营”（当时中国人称呼四方楼的大院为“兵营”）只见成年累月地往里抓人，但从来没看见有出去的。

这些被抓来的人都押在“方型楼”中间的特设牢房里。秘密监狱是两座白色的两层小楼，分七栋、八栋。七栋位于主楼东侧的广场上，八栋在主楼西侧空场。被抓进的人男女分别监押，同时可以监押百八十人。

这两座监狱通过地下道和解剖室、各试验室、焚尸炉相连接。

监狱的防卫是严密的，四周借用三层楼墙壁圈围着，只有和主楼连接处设一铁制的便门，设有武装岗哨。只要把住这个铁门，在押的人是无法逃脱的。平顶楼房的南端和北端是两处五层楼高的制高点，设有监视哨，在押的人一切活动都会看得一清二楚。

据川岛清在远东军事法庭上供认，从一九四〇年到一九